

中国计划城市化人口 与自发城市化人口对比研究

——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看“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在中国人口城市化研究中的不同地位

谢晋宇 于 静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这个新开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市场机制被引入城市化过程。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两种城市化人口并存的局面:一是由计划机制控制而形成的计划城市化人口;一是由市场机制控制而形成的自发城市化人口。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城市化人口已被学术界所关注(李竞能,1986;辜胜阻,1991等)。辜胜阻将这两种人口分别称为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迁移人口。这种定义揭示了两种人口城市化后不同的稳定性,但却未揭示两种人口形成的根据。本文将这两种人口称为计划城市化人口与自发城市化人口。很久以来,研究者一直苦于在常规统计中找不到自发城市化人口的数据,而用公安部门统计的流动人口替代。公安部门口径的流动人口是指在一个城市停留三日以上的人口,这中间大多数是在该市中转换车、探亲访友、治病、办理公务的短暂停留人口^①。“四普”所定义的“流动人口”正好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自发型城市化人口的空白。这次普查资料中“流动人口”有三项^②: (1)户口在外县市,但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口; (2)户口在外县市,虽在本县市居住不满一年,但离开户口地已一年以上的人口; (3)户口待定人口。之所以称这些人口为“流动人口”,是由于目前在中国户籍是区分城乡人口的主要标志,只有已迁户口的人才被统计为迁移人口,而未办理户口迁移的人即使是在地域上已经迁移了上千公里并已在迁入地安居下来了,也只能称作“流动人口”。此文继续沿用“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的说法,因为这一划分正好与本文所说的自发城市化人口和计划城市化人口相吻合。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成果,但许多论述给人模糊印象,就连“城市化水

平”这一基础分析指标至今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数据。“四普”资料中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项数据正好构成中国目前新近城市化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人口:迁移人口即为计划城市化人口,“流动人口”正是自发城市化人口。这两种人口在城市化形成机制与原因、城市化迁移决策、城市化后对城市的适应与归化、城市化的后果等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城市化对两种人口也有截然不同的选择性。因此,“四普”资料中这两种人口的划分对深化中国城市化研究有很大意义,可以拨开十多年来研究中的一些迷雾。

一、计划城市化人口与自发城市化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占比重和对城市化水平的修正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区域分布长期受严密的计划影响。计划机制对城市化的进程有决定性影响,是通过户籍制所统领的一系列限制人口迁入城市的制度和政策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人口城市化的主体只有计划城市化人口,即迁移人口一种。

改革开放后,长期被压抑的市场机制开始启动,并逐步发育成长,市场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中与计划经济既相互促进又互为矛盾的成分。这一机制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渗透和扩展自己的影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村人口城市化已形成不可遏制的

^①据天津市1987年6月一项专项调查,流动人口中中转过占23.2%,探亲访友和治病占17.4%,公务型占16.1%。转引自郝麦收、于静《天津流动人口科学调节》一文。

^②这部分人口按国际分析惯例,已经是城市化人口,被称为流动人口是不恰当的,容易和真正意义的流动人口混淆。国际分析惯例中流动人口包括通勤性(在居住地和工作地钟摆流动)和过境性(在目的地作短暂停留)两种人口。与“四普”资料的“流动人口”相差甚远,在运用中容易引起国外学者误会。

浪潮。中国城市化人口开始出现计划城市化人口和自发城市化人口二元化结构。随着市场机制作用日益扩大,改革开放前曾极为有效地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隔绝开来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开始失去其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户籍制等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虽未取消,但农民却突破限制,在没有户籍的情况下进入城市,并在城市长期生存。粮食市场的开放,使他们在无商品粮供应的情况下解决了口粮问题;房屋私产权的重新确立,城市住宅商品化等改革使他们在无住房分配单位的情况下可以自租或自购住房。在城市自身还存在较严重的待业、开工不足、人浮于事等问题的情况下,大量“流动人口”奇迹般地找到了自己的就业岗位。

两种城市化人口中计划城市化迁移人口增长受计划和政策控制,每个城镇都有每年由公安局等多级机关把关的进城控制数、农转非控制数。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曾经历过两次“反城市化”运动(Anti-urbanization),一次是60年代初压缩3000万城镇职工;一次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造成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计划城市化人口猛增。因为有相当数量的被赶到农村的城市人口回流。除了这种政治变动造成的计划城市化人口波动外,改革十多年来计划城市化人口的变动相对于自发城市化人口变动要平稳得多。十多年来自发城市化人口随经济波动消长的情形特别严重。由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是首次显示自发城市化人口数据,我们缺乏历史对比资料来分析其变动,但通过公安部门统计的流动人口资料可以看出其波动幅度大得惊人^①。这充分显示出自发城市化人口受市场机制控制的特点:在经济发展迅猛时期大幅度上升;在经济疲软时期又猛跌。这同时也表明自发城市化的农村人口不是一种彻底城市化的人口,他们还和土地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这种自发城市化的人口很类似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人口,其迁移是一种弹性迁移,不是一旦进入城市就不再发生逆迁移(迁回农村)。而与之对应的计划城市化则是几乎不可逆的,即使人已迁到农村,户籍也会保留在城市。

尽管自发城市化人口有这种波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却是呈明显上升趋势的^②(见表1)。这表明城市化受市场机制作用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些城市流动人口已与迁移人口持平,一些城市流动人口不仅超过迁移人口,甚至超过常住人口(深圳“四普”

表1 部分城市两种城市化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城市	计划城市化 迁移人口	自发城市化流动人口	
	1990年占常 住人口比重	1982年占常 住人口比重	1990年占常 住人口比重
北京	6.13	1.98	6.02
上海	4.86	2.12	5.02
天津	3.54	1.59	2.64
南京	—	1.86	6.60
武汉	—	—	5.94

注:本表常住人口均指全市(含市辖县)总人口,若计算市区内流动人口占市区总人口比重,数值会更高,因为流动人口集中于市区。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资料》1991年第130期;武汉人口分析资料》1991年第七期;《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南京)1991年第5期。

时流动人口为102.15万,是常住有户口人口的1.62倍;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等地的流动人口也大大超过迁移人口,甚至接近常住人口)。

随着价格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在城市的推进,户籍制将进一步丧失其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价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逐步取消城市中对有户籍居民的各种价格补贴,住房商品化也将使住房产权逐步由企业产权转向私有产权。这样的改革会迈多大的步子还不能定夺,但毕竟已起步,虽然会经历一个时期的曲折,但已开始并最终会动摇城镇商品粮限制供应和城镇住房有计划分配这两道最坚固的限制人口城市化的壁垒。可以肯定,未来自发城市化人口将更快增长。

中国城市化水平到底有多高,一直是困扰统计和研究部门的难题。国家统计局1988年公布,中国市镇人口已达49.8%,而1990年“四普”资料显示的城市化水平仅为26.2%,两个指标竟相差23.6个百分点。前者包含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市辖县、镇带村两部分农村人口被不正确地当成了城镇人口。后

① 据天津市公安局统计,在天津暂住三日以上的人口,1982年只有15万,1985年增至41.7万,1988年又猛增至81.3万,到1989年又猛跌为35.84万。转引自郝麦收、于静《天津流动人口的科学调节》一文。

② 本文所运用数据均为各地“四普”10%提前抽样汇总数据,故不再作附注说明,若有用其它来源资料时将专门说明。

表2 部分地区(城市)人口城市化过程对两种人口的选择性比较

选择性	迁 移 人 口					流 动 人 口					
年龄选择性 (%)	地区	0~14	15~29	30~44	45以上	地区	0~14	15~29	30~44	45以上	
	湖南	8.5	67.4	14.8	7.3	天津	30.6	39.0	19.6	10.8	
						东莞	40.9	50.0		6.0 (30以上)	
						宜昌	—	—	60.0	—	
性别选择性 (%)	地区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山东	47.2		52.8		宜昌	53.3		46.7		
	黑龙江	63.9		36.1		青海	65.4		34.6		
	天津	57.7		42.3		天津	51.2		48.8		
						陕西	58.9		41.1		
						广东	50.0		50.0		
文化选择性 (%)	地区	大学	中学	小学	文盲	地区	大专以上	中专	中学	小学	文盲
	湖南	14.5	54.4	25.4	5.7	宜昌	0.78	—		64.8 (中小学)	8.2
						天津	1.7	1.2	42.1	27.7	9.3
职业选择性 (%)	地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农林牧渔	生产运输工人	地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农林牧渔	生产运输工人	
	湖南	12.3		34.0	32.2	天津	4.6		14.1	55.9	

注：迁移人口均指省际迁移人口。

资料来源：《统计资料》(湖南)1991年第81期；《湖北统计资料》1991年第43期；《人口普查资料》(山东)1991年第10期；《统计与调查》(青海)1991年第39期；《人口普查资料分析》(陕西)1991年第29期；《广东人口分析》1991年第四期；天津资料由天津统计局提供。

者定义的市镇人口指市辖区居委会人口，甩掉了前者所含农业人口，也显然甩掉了大量业已城市化的“流动人口”。“四普”资料中“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一年以上的人口和户口待定人口，这部分人口实际上已是城市的“稳定人口”。尤其是考虑到1990年是中国进入经济紧缩阶段后的关键一年，流动人口中在城市未能站住脚的已返土，普查时的人户分离人口基本上就是在城市已安定下来的人口，将此作为自发城市化人口，是站得住脚的。“四普”资料中“流动人口”数加上城镇人口数，可以较为准确地作为中国1990年城市化水平的替代值。这种修正可以由各级统计部门直接进行，数据来源一致又是现成的，比用其它方法和不同来源的资料(如非农人口，工业化率以及专门典型调查)可操作性和覆盖面更高。根据部分省份10%提前抽

样汇总数据，可以看出这些省份城市化水平的估计数。其中青海为其普查得出的城市化水平数再加4.04个百分点，广东再加5.24个百分点，陕西再加2.44个百分点。每一省市流动人口均分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但流入和流出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由乡村流入城市，因此可以用流动人口总数(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之和)来替代自发城市化人口。当然“流动人口”中总有一部分是由农村流入农村，一部分是由城镇流入城镇，不是严格的城市化人口。但各地普查分析显示，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口绝大多数还是从农村流入城镇的。更精确一些的对城市化水平指标的修正可以采用下列公式：一个省城市化修正水平=该省普查城市化水平数+省内从农村流向城镇流动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省外从农村流入本省城镇的流动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

二、城市化对两种人口的不同选择性

迁移对同一人群中不同特征的人有选择性,如选择男性或女性,年轻人或老年人。城市化这一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同样存在对同一人群不同特征的选择。而且计划城市化与自发城市化人口表现出有很大差异。

(一) 年龄选择性。两种人口差别不大,都有选择15~29岁人口的倾向(见表2)。在中国目前国情下,人口计划城市化的途径有工作调动、分配录用、投亲靠友、婚姻迁入、家属随迁、学习培训和退休退职,其中除投亲靠友、退休退职有选择老年人口的倾向外,其它几种途径都有选择年轻人口的倾向,而投亲靠友、退休退职占全部迁移人口的比重很小(见表3)。自发城市化人口受市场机制

控制,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稳定性较差,因此更易选择年轻人口。表2显示,城市化中“流动人口”比迁移人口更具有选择年轻人的倾向。在年龄选择方面,中国城市化和西方迁移理论所证实的特征一致,即20至30出头年龄的人最具有流动性。

(二) 性别选择性。性别选择性情形较复杂些。在迁移人口中只要婚姻和随迁家属两项比重较大,这一个地区迁移人口性别比就会偏低,女性在这两项迁移中占多数(山东迁移人口中此两项占比重高达38.97%,故女性人口占迁移人口的52.8%)。与“流动人口”相比,一般情况下迁移人口性别比接近100。“流动人口”在大多数地区呈选择男性的倾向,因为“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口比重大,而且从事重、脏、累活的人较多,从事建筑业

表3 部分城市两种城市化人口迁移原因比较 (%)

城 市	计划城市化迁移人口								城 市	自发城市化流动人口							
	经济原因			社会原因				晋升		经济原因			社会原因				晋升
	务工 经商	工作 调动	分配 录用	投亲 靠友	退休 退职	随迁 家属	婚姻 迁移			培训 学习	务工 经商	工作 调动	分配 录用	投亲 靠友	退休 退职	随迁 家属	
	天 津	20.02	8.93	5.99	17.43	0.79	7.82	9.56		26.85	天 津	40.70	4.42	1.54	24.07	1.01	10.11
武 汉	31.15	7.30	2.69	6.65	0.53	8.87	6.93	19.08	武汉 汉口区	71.79	2.42	0.77	4.89	—	7.22	8.82	—
吉 林 市	8.02	14.74	5.05	18.41	0.45	19.48	13.89	13.58									
西 安	22.47	15.60	6.83	6.73	1.84	11.32	5.70	27.86	宜 昌	62.00	—	—	8.28	—	—	10.68	7.49

资料来源:《武汉人口分析资料》1991年第6期,第7期,第24期;《人口普查资料》(吉林市)1991年第7期;《人口分析》(西安)1991年第23期。天津资料由天津市统计局提供。

的有较高集中趋势,在该行业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这些都有提高性别比的作用。但在有些地区以吸收女性职工为主的产业较集中,这些地区“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偏低。如广东省流入人口中女性占70%之多,因为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产业吸引了较多的省外女性劳工。

(三) 文化程度选择性。计划城市化人口

表4 部分地区(城市)计划城市化迁移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

(一) 省内迁入和省外迁移比重(%)

地区(或城市)	武 汉	西 安	宜 昌	安 康	辽 宁	湖 南
省内迁入比重	75.16	58.78	43.25	71.00	62.10	82.90
省外迁入比重	28.84	41.22	56.75	29.00	39.70	17.10

(二) 跨省迁入中来自邻近省份的比重(%)

地区(或城市)	辽 宁	西 安	武 汉	天 津	山 东
比重	70.20	41.20	59.50	45.66	36.90
来地源	黑龙江、吉林 山东、内蒙、河北	河南、四川 甘肃、山西、宁夏	四川、河南 湖南、安徽、江西	河北、山东	东北三省

是以前办理户口迁移为特征的。由于户口转移具有很高的可控性,城市化过程对于迁移人口的选择性也是可控的。城市不仅每年限定迁入人口的数量,也设置许多门坎来限制迁移者的质量,以利于迁入对本城发展有益的人才。改革十多年来,各地已放开了对高文化程度人口迁入的限制,对迁入者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文化程度高并具有各类技术技能的人被迁入地接受的可能越来越高。表2引用湖南“四普”资料所显示的迁移人口文化构成,从表面上看大学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不如小学,但如果从各种文化程度的迁移人口占全省该文化程度的比重看,则大学文化程度的迁移者占到了30.46%,而中小学只分别占9.47%和1.43%,文盲占6.14%。对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选择性极高。相比之下,“流动人口”选择的迁移者集中在小学和中学程度,大学文化程度极少,这与中国广大农村文化构成偏低的情况相吻合。

(四)职业和行业的选择性。计划城市化的迁移人口在取得迁移资格前往要经过考试或审核,要么取得文凭,要么通过了招生、招工考试等。一般城市中生产工人和运输工人只要求简单劳动,所以不需要引进外地劳动力。对迁移人口也可以形成类似文化程度选择性的选择高级职业的机制。表2中所引湖南迁移人口职业构成比重,似乎农林牧渔和产业运输工人最高,但这个比重与全省总在业人口中这两个职业人口所占比重89.53%相比,就低得多。说明这两种职业人口的迁移不很活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虽仅居第三位,但这个比例(12.29%)却比在全省在业人口中同一比例(4.08%)要高出许多,其迁移人数也占到全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7.7%,说明专业技术人员迁移活跃。相比之下,“流动人口”却集中在农林牧渔、生产和运输工人两大类上(天津“流动人口”有70%多在这两大类上)。

从行业分布看,迁移人口从业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其从业比重远远高出一个地区总在业人口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湖南迁移人口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比重高出全省第二产业人口比重24.54%和21.74%)。而“流动人口”虽然也有集中在第二产业的趋向,但更多的在手工劳动部门或传统部门谋职或者在城市人口不愿意从业的行业;或者如托达罗所说集中在非正式部门(托达罗所说非正式部门包括:(1)零星商业、露天摆摊、货担叫卖;

(2)人力车运输、清扫业;(3)做女招待、佣人等〔托达罗,1977〕)。在天津,扫马路、倒垃圾、掏地沟、打扫厕所、园林绿化工作大部分由外地民工承担;而一些社会服务业,如修鞋配钥匙、修表、刻字、磨刀、保姆、运煤入户等也主要是外地来津人员从事的;在大众化饮食业和旅店外地来津人也不少〔郝麦收、于静,1991〕。

三、两种人口不同的城市化原因

迁移是对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刺激的反应。居住地环境改变或一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都会产生这种刺激。“四普”资料中对迁移原因的分类相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过于概括了。而且准确地说“四普”资料中的迁移原因实则是迁移渠道。如“工作调动”是不能作为迁移原因的,只显示迁移者是通过工作调动这一手段而达到了迁移目的,实际隐含的迁移原因可能是原有工作收入太低、原来工作地工作、生活环境不好和夫妻分居等等。

如果将“四普”资料中务工经商、分配录用、工作调动三项合类为以经济目的为迁移原因(实际上很不准确,其中隐含了许多因家庭、环境原因而迁移的人);将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婚姻迁入合而为以社会目的为迁移原因(这也失之笼统,社会原因应更具体化为维持亲属关系、社会晋升、生活方式偏好、改变环境等性质不同的几类〔德·琼等,1981〕,这种概括也隐含了许多以经济目的为主的迁移);将学习培训具体化为以社会流动(晋升)为迁移目的,这样表3明确显示出,迁移人口更多是以社会晋升和其它社会原因为迁移目的,而流动人口更多以经济原因为迁移目的。

四、两种人口不同的迁移决策过程

(一)迁移者决策。西方迁移理论中迁移决策的单位是家庭户。单身个人在离开家庭后也自身构成决策单位。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决策者则完全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就迁移人口来说,决策单位既是迁移者或家庭,也不是迁移者或家庭。因为决策权不在他们手中,而在户籍管理部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途径有:(1)亲属投靠;(2)招生;(3)招工;(4)土地征用。只有幸运地碰到其中一种情形的农村人口才有迁移决策的前提,这时迁移决策要解决的是迁还是不迁。对于处于这种背景中的人来说,决策不迁的人微乎其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决策者的决策重点是自己怎样才能挤进上述几种途径。在这之

后他们就没有太多好作的了。就迁移人口来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他们不需要自己去找其它信息，住房、口粮、职业都有计划来保证优先解决。实际上国家是这一迁移的决策单位，迁移者自身在迁移中许多责任和风险都被公安、劳动、卫生、房管、民政、粮食等各部门承担了。这样的迁移者不能不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了。

流动人口的迁移决策单位是家庭户或个人，对他们说来，迁移决策要艰难得多。首先是决策迁还是不迁，在这一关键的决策步骤中他们必须权衡迁移的各种成本：经济成本（交通和移动安置费用）、机会成本（因流动和等待工作所损失的收入）、心理成本（对迁入地的不适应引起的心理压力等）；其次是了解和搜集关于这一迁移事件更详细的信息，如在迁移后寻找住房、职业的可能性；三是要权衡迁移行为会产生的后果。

（二）迁移目的地决策。“四普”资料显示迁移人口在决策中主要以本省内城市为目的，而跨省迁移则主要以邻近省份为目的（见表4）。 “流动人口”情形也相似，以流动人口居全国首位的广东为例，其省内流动超过省外流动44.46%。这说明在迁移决策中，距离还是一个起很大作用的因素。中国国土面积广大，生活风俗、气候、文化等各方面差异很大，是迁移的重大障碍因素。这还反映出中国人不离家传统的影响，也反映出中国省际经济交流和交通还不发达，统一市场还远未发育成熟，行政界线的作用仍大于经济分区。

（三）决策信息来源。迁移人口的迁移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对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把握。而流动人口则明显依赖于一种链式信息系统，即已迁移到城市的亲朋好友提供的关于迁入地机会的信息，成为流动人口迁移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在这种信息传递中极易形成迁移链。前面的迁移者不仅为后面的迁移者提供信息，还提供迁移过程中的各种便宜（食宿、交通路线的安排、职业的寻找、心理慰藉等）。在各个城市中都可以找到流动人口集中的相互认同的小区，他们在行业上也形成以相同迁出地为标识的“邦”。如从事保姆业的来自安徽，从事服装业的来自浙江等等，都是一种链式积累的结果。在计划迁移人口中就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链”，也不存在这种形式的人口聚居现象。

五、两种人口在城市化后对城市不同的适应与归化过程

计划迁移人口在迁移后能较快归化为城市人口。通过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婚姻迁入、家属随迁等途径城市化的人往往是作为个体而不是群体加入城市生活的，因此极易被他们所加入的工厂、机关、学校和邻居等吸收和影响，在角色、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等各方面接受城市社会的影响。由于他们是个体式迁入城市，即使在同化过程中有较大心理障碍也不足以与城市社会形成抗衡力，克服起来也较容易。更关键的是迁移人口文化程度高、迁移后职业和生活稳定，形成了同化的有利条件。

“流动人口”的适应和归化过程要复杂得多。他们首先要面对城市老居民的歧视和偏见。中国几十年严密的城乡隔绝，已经在城市居民中形成一种优越感，城市户籍所附带的各种优惠使城市户籍成了一种特权。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城市居民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流动人口从事的社会服务业解决了他们许多具体的生活困难。流动人口所干的劳保条件差、强度大的工作实际上是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干的活，对他们是一种解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又的确抢走了他们许多既定好处，城市更挤了，物价也上扬了。这正是“盲流”这样的歧视性称呼在社会流行的民众基础。其次流动人口要面对城市管理部门设置的种种限制，甚至是“堵”、“卡”、“罚”、“赶”这样的不公正对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自发城市化人口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化人口还有较大区别，计划经济对他们也还是有影响的。就天津而言，流动人口从租房、就业等关系到迁移稳定性的环节上有许多审批手续和管理条例实施。

再次，在城市化后很长时间内流动人口波动于寻找住房和职业，即使这些都已安顿好了，其子女就学、家属就医等问题仍要困扰他们很久。武汉市以流动人口聚居而著称的复兴小区（流动人口占该区人口的72%），在“四普”时发现一个不到6000人的居委会（普查区）竟有122名6~11岁儿童未入学。该区三所小学，有两所未得到教育部门认可，各种条件都极差，实际上是学生家长集资自办的（周望宝、张仰刚，1991）。在居住上流动人口多选择房租较低的城乡结合部，形成自我封闭的棚户区。在他们归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道路上还存在许多障碍；这种障碍一时还不易清除，由此引起一些严重社会问题。如市中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冲突，流动人口犯罪率上升、性生活混乱、酗酒、疾

病、营养不良、文盲增加、精神病发病上升等，对这些问题如不予以重视，会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

当然，流动人口中也有一些在城市化后归化和适应很顺利的、主要是在经济上率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有能力自己购买国家统建的商品房或租住租金较高的民房，从而脱离流动人口聚集地。

六、两种人口对生育率的不同影响

人口城市化最显著的一个后果就是对出生率有降低作用。但在中国，人们看到的是十分矛盾的现象，一些地区的城市化降低人口出生率，如苏南小城镇地区（姚敏华，1991）；一些地区城市发展了，人口出生率却上升了，如广东。这使研究者对城市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感到困惑。

“四普”资料缺乏对迁移人口生育状况的描述。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年对全国74个城市迁移人口的调查分析看，中国迁移人口出生率低于城市的老居民。很显然，这取决于城市化对迁移人口特定的选择性、特定的迁移途径和他们在城市化后特定的适应和归化过程。迁移人口文化程度较高，迁移后立即得到各种优惠并很快融合到老居民中，在生育行为上与城市老居民很快认同；同时他们在迁移流动中引起的分居、婚姻推迟等也起了降低生育率的作用。

自发城市化人口的生育率可能低于流出地人口，但却高于常住人口（见表5）。流动人口高生育率已是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人口城市化是未来10年控制中国人口增长最应启动的机制之一（中国人口控制与社会发展 武汉会议，1991），但没有注意到自发城市化人口出生率并不因城市化而下降。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城市化人口分开而产生的。

流动人口高生育率的原因很多，如管理跟不上，有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动机就是超生等。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城市人口的二元化。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二元结构：有户口和无户口的。有户口人口从出生到死亡都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加上城市抚养儿童费用高、妇女参与工作、城市各种设施不足等因素共同作用，有户口的迁移人口自然趋向于选择低生育。无户籍的流动人口在没有这些优惠的情形下仍会象他们在农村时那样依靠多子女作为生活的最大保险。加之他们城市化后失去社会组织的控制、文化素质低、就业的培训费用较低、子女加入劳动大军年龄较轻等因素共

表5 天津市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生育率比较

		育龄妇女人数 出生数、GFR%		
全 市	常住人口	251 140	14 205	56.56
	流动人口	62 232	5 190	83.40
市中心区	常住人口	102 341	4 435	43.34
	流动人口	18 376	1 112	60.51
滨 海 区	常住人口	26 521	1 257	47.40
	流动人口	22 831	1 164	50.98
郊 区	常住人口	36 321	1 834	50.49
	流动人口	8 153	702	86.10
县	常住人口	85 957	6 679	77.70
	流动人口	12 872	2 212	171.85

① 常住人口出生率资料为10%提前抽样汇总数据；流动人口出生率资料为100%机器汇总数据。

资料来源：由天津市统计局提供。

同作用，刺激多生育。乡村人口生育观是不易改变的，尤其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化后的适应和归化上遭遇这么多障碍，不利于其在生育行为上接受城市人的模式，某种意义的多生育已成为他们对抗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的报复手段。事实上，有些地区（如湖北宜昌、天津东郊区）对流动人口生活上关心，帮助他们解决实在的困难，流动人口生育率控制工作做得很好。可以相信在城市化后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会在下一代或几代之后）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是会改变的。

参考文献

- 李竞能《人口城市化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研究》，《人口情报与研究》，1991年第2、第3期。
-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 周望宝，张仰刚《对流动人口占72%的复兴小区的初探》，《武汉人口分析资料》第10期（1991年）。
- 郝麦收、于静《天津流动人口的科学调节》，1991年（未发表）。
- G.J.Lewis, "Haman Migration", Croom Helm, 1982年。
- G.F.Dejong; R.W.Gardner,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an Press, 1981年。
- （本文责任编辑：徐莉）
- （作者工作单位：谢晋宇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于 静 天津市人口普查办公室）